

外资企业控股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为例

茹玉骢,张利凤

(浙江财经学院 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从政治经济学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对我国合资项目的控股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方对外资企业控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外资技术等溢出效应,政府引资行为类似于一种能产生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引资决策者和公众相比存在偏好差异,随着引资决策集中程度的提高,政府主观公共品租金的增加会导致过度引资现象。在政府合资的非利润动机下,外国投资者最大程度地抽取合资企业的利润,使得合资企业的利润为零。本文还结合一个外资市场进入博弈讨论了中方控股的条件,认为中方控股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我国低价格的人力资本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则能缓解中方控股带来的效率损耗,使得中方控股成为可能。

关键词:FDI;控股权;政治经济学;公共租金

中图分类号:F016;F019;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08)03-0028-05

随着中国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引导外资产业流向、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产业调整是中国政府产业政策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政府于 1995 年、1997 年、2002 年和 2004 年先后 4 次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为《目录》),以适应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按照我国外资产业政策,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同时《目录》对分属于这 4 类的具体产业的控股权做了规定(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产权应当归于对合作剩余贡献大的一方,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但是,显然中国在外商投资方面对“控制权”的要求并不仅仅考虑到效率问题,还涉及对其他利益的考虑。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目录》中的某些产业必须由中方控股的原因。另外,外方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牺牲控制权而与中方合作,中方控制权的获得对于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对外资的投资决策有何影响,也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目前有关 FDI 产业控制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企业控制权问题的研究;二是外资产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本文所要讨论的合资企业的控股

权问题属于两者的交叉领域。企业控制权或产权问题是现代企业理论和不完全合约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第一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第二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外资政策的制定以及外资中的所有权比例的确定等问题。杨建龙^[1]运用博弈论模型对东道国政府外资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做了理论分析,认为东道国对外资政策的两个重要维度——优惠政策和开放度的选择是其与外资企业在外资规模和质量两个变量选择上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外资质量的高低则与外资政策的优惠政策偏向及开放度偏向相关。这个分析框架虽然比较清晰地说明了外资政策的形成是东道国和外资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东道国外资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却研究不多。

关于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问题涉及跨国公司如何选择子公司的产权结构的问题,有两种假说:第一种是交易成本假说,认为跨国公司股权结构的选择服务于海外业务成本最小化目的;第二种是谈判能力假说,认为股权结构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协商的结果,而此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Gomes-Casseres^[2]用同一分析框架对这两种假说进行整合,并用统计方法对上述两种假说加以区分和检验。他的统计分析支持“通过讨价还价决定所有权比例”的假说,而不支持有关交易费用的解释。

收稿日期:2007-11-25

基金项目:受浙江财经院校级一般课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2006 YJ Y050)资助

作者简介:茹玉骢(1974—),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学院经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张利凤(1972—),江苏张家港人,浙江财经学院经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学。

Lecraw^[3]认为,当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当地政府的相对谈判能力提高时,它在海外投资中获得资产的所有权比重也会提高。Pan^[4]检验了影响外资企业所有权偏好(ownership preference)的因素和东道国的所有权让步(ownership concession)因素,认为政府所有程度越高的企业有更大的能力使外国投资者只获得较低的控制权比例。他的计量检验表明,当外资企业和中央或省政府所有企业合作时,外国投资者不倾向于拥有大部分所有权。Desai、Foley和Hines^[5]主要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公司的部分所有权的决定问题,认为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贸易管制,以及美国对合资企业税收政策变化所做的反应,导致了跨国公司内贸易量的增加和完全所有权程度的提高。以上这些理论只是解释了合资企业的产权结构(所有权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受哪些因素影响,虽然也强调了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当地政府之间的谈判能力是决定所有权结构的重要因素,但是缺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的决策(产业控股)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外资企业的相互博弈对控股权问题做了重新考察,认为东道国对控股权的要求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官员对外资溢出效应的认知,政府引资类似于提供一种能产生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由于和公众相比,引资决策者更偏好于这种公共品的供给,因此随着决策集中程度的提高,政府主观公共品租金的增加会导致过度引资现象,外资企业将通过租金抽取得到全部的合资利润。本文还结合一个外资市场进入博弈讨论了这种中方控股的条件,认为中方控股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我国低价格的人力资本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能缓解控股带来的效率损耗,使得中方控股成为可能。本文结构如下:文章先对我国中方控股权产业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然后讨论这些要求中方控制项目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讨论了决策者偏好和决策机制对引资公共租金的影响,接着基于古诺模型讨论合资企业中控股的约束条件,并讨论了外资的寻租行为,最后进行结论总结和 Related 讨论。

1 外资企业中控制权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

首先比较 1995 年、1997 年、2002 年的《目录》中要求中方控股产业项目的情况。1995 年和 1997 年几乎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1995 年是 32 个产业

项目,1997 是 31 个。2002 年的变化比较大,由于受加入 WTO 的影响而减到 22 个。受加入 WTO 的影响,受控制权影响的产业项目种类大量减少,中方放弃了对这些产业领域项目的绝对控制权,这些产业项目大部分属于受政府保护和扶植发展的产业,加入 WTO 的原因使得中国政府逐渐放弃对它们的保护。政府对有关产业项目股权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避免外资在这些行业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由于我国加入 WTO,1997 年版《目录》中的一些限制类项目在 2002 年版《目录》中变成了鼓励类项目;与 1995 年版和 1997 年版的《目录》相比,2002 年版《目录》中要求中方控股(包括相对控股)的产业有如下特征:具有民用公共品特征;具有重大军事和科研技术进步意义的国防公共品特征。具有前者特征的产业项目包括:综合水利枢纽的建设、经营;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经营;民用机场的建设、经营、航空运输;城市地铁及轻轨的建设、经营;成瘾性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原料药生产;铁路旅客运输;大中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民用公共设施或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特征。而具有后者特征的产业项目包括:民用直升机设计与制造;航空发动机设计与制造;民用航空机载设备设计与制造;特种船、高性能船舶的修理、设计与制造;船舶中高速柴油机、辅机、无线通讯、导航设备及配件设计与制造;民用卫星设计与制造;民用卫星有效载荷制造;民用运载火箭设计与制造;核电站的建设、经营、测绘公司、摄影、探矿、工业等通用航空。这些产业项目几乎都与军用航空航天器、船舶技术进步和军事信息安全有关,同时其相关技术的提高都有助于我国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通过对这些外资项目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外资的技术外溢,提高本国的军事和科技进步水平,同时也可增强对这些产业的政府监管,保证我国的军事和社会公共安全。

2 引资的政治经济学——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我们假定东道国政府要求对项目绝对控股有两个目标:一是利润,二是军事或科技进步。对东道国政府而言,东道国政府通常缺乏利润动机,或者说东道国政府在合资项目中的利润获得在政府效用函数中的权重很低,而项目的技术水平及技术溢出在政府效用函数中的权重却很高,因此可以把合资项目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看成是政府购买的一种公共产品

g , 也就是说, 这些合资项目具有很重要的社会福利含义, 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 (u^1, u^2, \dots, u^i) , 其中 $u^i(c^i, g)$ 是第 i 个消费者消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效用函数。要说明的是, 社会计划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P_g 会随消费者两种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替代率 $\frac{u_g^i}{u_c^i}$ 的变化而变化, 因为这个价格是所有消费者边际效用替代率的总和。也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偏好于国防安全产品消费, 那么消费者对军事安全产品和私人产品消费的边际收益替代率会上升。但是 P_g 是理论上公共品的最优社会支付价格, 在消费者偏好揭示机制不畅的情况下, 实际的 P_g 受官员主观偏好的影响, 官员对公共品的偏好常常会提高东道国购买该公共品的支付意愿, 即 $P_g > P_g$, 这反映在引资问题上则是, 中国各级政府都极力希望 FDI 是以合资并受中方控股的形式出现, 从而获得外资的溢出效应。

政府引资所支付的成本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政府宣传、讨价还价等付出的交易成本, 这些成本在本文中视为政府对外资企业的一次性总转移支付 TR , 它反映了政府生产外资外溢准效应公共品的生产成本。该公共品对于东道国的社会价值应该等于社会计划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P_g , 如果合资项目的利润是 f_{di} , 那么中方由于控制了 $(1 - \theta)$ 的股份, 即中方绝对控股, 则中方能获得的利润就为 $(1 - \theta) f_{di}$ 。我们把 $R = P_g + (1 - \theta) f_{di} - TR$ 定义为通过外资引进东道国政府的主观公共租值。当引资决策者对该准公共品的偏好要强与社会公众的偏好时, 即 $\frac{u_g^i}{u_c^i} > \frac{u_g^j}{u_c^j}$ (其中前者是引资决策者的偏好, 后者是公众的偏好), 由于在政府引资决策中引资决策者对引资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社会其他成员的偏好, 替代性的高低由引资决策机制类型 (即是集中决策还是分散决策) 决定, 则随着这种替代性的提高, 东道国引资决策者对于引资公共品的主观评价 P_g 就会提高。而实际公共租金 $R = P_g + (1 - \theta) f_{di} - TR$, 在相同成本下, 这种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偏好的替代性导致引资决策者主观公共租金提高, 即决策者主观公共租金要大于实际的租值 ($R > R$)。对于引资决策者来说, 只要主观公共租值 $R > 0$, 那么引进具有能产生准公共品的外资项目就是有效率的, 或者说是具有主观上的帕累托改进的。但是, 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公共

租金要比政府的主观公共租金小, 甚至为负, 所以这种帕累托改进是决策者主观的一种判断, 实际上在考虑社会成员的偏好时, 这可能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因为过度评价会导致引资成本过度支付。

由于主观公共租金的存在, 即便外资项目不产生利润, 但只要东道国引资决策者对该项目产生的准公共品的价值评价 P_g 足够高 (引资成本 TR 相对不变), 那么就会认为引进外资是有效率的。因此, 对于同一个具有特定公共品意义的外资项目, 高度集中决策型 (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type) 经济体的主观公共租值 R^c 小于分散决策型 (de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type) 经济体的主观公共租值 R^d , 或者说高度集中决策型经济体的决策者引资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成本 TR_{max}^c 会大于分散决策型经济体的引资决策者为引资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成本 TR_{max}^d , 即 $TR_{max}^c > TR_{max}^d$ 。

这个最大值是引资的最大支付成本, 反映了政府引资决策者通过自己研发来获得类似技术进步所愿意承担的财政预算。 TR_{max}^c 和 TR_{max}^d 之间的差可看成是一种由公共选择机制 (即两种不同的决策类型) 差异而引起的扭曲, 决策的集中程度越高, 这种扭曲就越严重。对于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治理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一方面, 地方引资决策者对外资的偏好程度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引资投入, 另一方面, 引资决策程序的集中程度也是影响地方政府引资投入的重要因素。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 地方政府实际上会放松控股管制政策, 增加引资投入成本, 引资决策者会过度强调外资的重要性, 从而过度进行引资投入, 以致加剧政府资源的扭曲性配置。

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方法抽取这种公共租金, 最后使合资企业的利润为零。即便如此, 地方政府仍然会积极引进外资, 因为当引进外资的外溢效应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时, 那么只要前面讨论的主观公共租值大于零, 这种外资引进依然会发生。因此, 在创办合资企业的过程中, 东道国政府必须能获得一个非负的公共租金, 而参与合资的中方企业要求获得一个非负的利润, 在满足这两者的参与约束下, 跨国公司将尽可能地抽取或转移合资企业的利润, 最终使合资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

3 东道国股权管制下的外资区位选择博弈分析

前文分析了外资需求,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跨国

公司会进行海外投资并且同意东道国控股呢? Antras^[6]和 Helpman^[7]认为,产业特征会影响跨国公司对企业边界的决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生产能力强的跨国公司倾向于海外一体化而非外包方式开展生产活动。我们假定虽然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该技术的相关产品或引进外资进行生产,但是通常通过购买不能达到获得技术的持续外溢的目的和外资外溢的综合效应。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家企业生产某种产品 x , 该产品属于东道国合资控股管制的产业。假设国内企业不能生产或能生产但质量不高,政府具有强烈的进口替代或提升本国产品竞争力的愿望,且希望通过合资并控股来实现这个目的。再假设两家企业的产品性能非常相近,具有高度的替代性。据此,我们采用古诺博弈模型对两家跨国公司的最优产量决策加以分析。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跨国公司要做出是否到东道国投资的决策。

假定 x 产品的世界市场需求函数为 $P_x = a - bQ_x$, P_x 是产品的市场价格, Q_x 是市场总产量, a 是表示市场容量大小的常数, b 是一个反映产品需求对价格的弹性系数。每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pi_i = P_x Q_{x,i} - TC_i (i = 1, 2)$, 于是可得到均衡的产量解 (q_1^*, q_2^*) 。假设产品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q_i^* = m_i H_{i,F}^{1-F} (i = 1, 2)$, 其中 m_i 为中间品投入, 其生产函数为 $m_i = A_i K_i H_{i,m}^{1-m}$ 。其中, A_i 是生产效率参数, A_i 越高, 则在相同的成本约束下获得的产量就越高, 在此我们假设两家企业的生产效率不相等, 即 $A_1 > A_2$; K_i 、 $H_{i,m}$ 和 H_i 分别是生产中间品的所需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最终品所需的人力资本, 并把两种人力资本看成是同质的; 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投入要素价格分别用 r 和 w 表示, 它们是外生给定的。把中间品生产函数代入最终品生产函数, 得到 $q_i^* = A_i K_i H_i^{1-F}$ 。

在完全信息古诺博弈中, 市场需求函数、双方的生产成本都是共同知识, 我们可把利润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成本最小化问题。本文假定, 在外商直接投资以前, 两家企业所面临相同的外生要素价格 r 、 w , 因此可将古诺模型的均衡解重新表达为:

$$q_1^* = \frac{[aE_1E_2 + (E_1 - 2E_2)]}{3bE_1E_2};$$

$$q_2^* = \frac{[aE_1E_2 + (E_2 - 2E_1)]}{3bE_1E_2}。$$

第 i 个厂商在生产古诺均衡产量 $Q_{x,i}^*$ 时面临的边际成本 $MC_i = \frac{1}{E_i}$, 其中 $E_i = \left(\frac{w}{1-F}\right)^{1-F} \left(\frac{r}{F}\right)^F$,

$E_i = A_i$ 。也就是说, 生产效率越高, 生产的边际成本就越小。从上式中我们可以得出古诺模型中的一般结论, 即生产效率高 (或者成本低) 的企业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即 $q_1^* > q_2^*$ 。此外我们也可以得到在这个古诺博弈中海外直接投资未发生前两家企业的利润 π_i , 这时候只有国际贸易而没有跨国投资。

现在考虑发生海外投资的情况。为不失一般性, 我们假设企业 1 的生产效率比企业 2 要高, 按照 Dunning^[8]、Rugman^[9] 提出的跨国投资折衷理论 (eclectic theory), 只有能力强的企业才会对外投资和贸易, 因此企业 1 更有激励通过海外投资取得更大市场份额和利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沉没成本 f , 包括信息收集、谈判、新建厂房和设备等费用。外方投资并同意中方控股的约束条件必须满足: 外方在中方控股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利润要大于其直接出口获得的利润, 即必须满足 $\pi_{fdi} > \pi_1$ 。外资企业把中间产品的生产放到东道国, 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东道国价格低廉的人力资本, 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 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

假定现在直接投资项目已经发生,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假定中间产品在东道国合资企业生产, 而最终品由外国投资者母公司生产, 合资企业向外国母公司提供最终品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外方控股的比例为 α , 中方控股的比例为 $1 - \alpha$, 并且满足 $1 - \alpha > 1/2$, 即中方绝对控股并具有对中间产品的定价权 (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个定价权实际上是被架空的)。我们忽略运输成本, 合资企业和生产最终品的外国投资者母公司分别最小化成本。这样, 生产中间产品的合资企业的总成本为: $r_f K_i + w_f H_i - TR + f$, 其中 f 为对外投资发生的沉没成本, TR 为合资企业能获得的由优惠政策等带来的一次性转移支付。由于合资企业是中方控制的, 因此外国投资者最小化最终品生产成本, 而合资企业最小化中间品生产成本:

$$\min (r_f K_f + w_f H_{f,m} - TR + f),$$

$$s. t. A_i K_f H_{f,m}^{1-F} = m^*;$$

$$\min (p_m m^* + w H_{1,F}),$$

$$s. t. m H_{1,F}^{1-F} = q_1^*。$$

其中, r_f 和 w_f 分别是东道国的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价格。考虑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令 $r_f = r$ 。尽管东道国由于控股而拥有中间产品的定价权, 且可通过定价使合资企业的利润为正, 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个定价权是相对的, 跨

国公司可以选择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生产中间产品,从而使合资企业的经济利润趋于为零,因此实际上在一开始外资企业就会通过各种方法让外资企业的利润为零,使得中方合资的基本条件刚好满足。因此合资项目的均衡状态的经济利润为零, $p_m m^* - (r_f K_f + w_f H_{f,m} - TR + f) = 0$ 。根据前面的分析,盈利并不是那些具有公共福利意义的外资项目的主要目的,只要公共租金为正,项目就有效率改进意义。由于在东道国和外资博弈过程中这一点是共同知识,因此外方会想方设法(通过转移定价、提高外方人员福利)使合资项目维持在零利润水平。因为外方知道,即便项目没有盈利,由于项目对东道国政府来说具有正的公共租金,东道国政府也不会轻易放弃项目。当外资项目具有公共福利意义时,外方总是有动力侵蚀利润和寻租。又因为外资项目对东道国政府具有公共品意义是共同知识,外方会尽可能游说东道国政府以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来侵蚀公共租金 $p_g - T$ (在利润为零的条件下)。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外方游说的结果是获得的优惠能够弥补其新设工厂所需的成本,即 $TR = f$, 因为合资企业的均衡经济利润为零,所以中方是否控股对于外资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不构成直接影响,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最优决策规划中没有涉及控股参数的经济学含义所在。而对外方决策有影响的是控股后生产效率的变化。由于控股权对生产效率有影响,所以控股比率间接影响了外资的投资决策。在中间产品的利润为零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后合资企业的利润为:

$$f_{di} = \frac{1}{9b} \left[\frac{aE_f E_2 + E_f - 2r_f E_2}{E_f E_2} \right]^2$$

新的边际成本为 $MC_{f_{di},1} = f_{di} / E_f$, 其中,

$$f_{di} = \left(\frac{r}{1-r} \right) \left(\frac{w}{1-w} \right)^{1-\alpha} \left(\frac{w_f}{r} \frac{1}{1-r} \right)^{\alpha(1-\alpha)}, E_f = A_f。$$

外方在直接投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利润是 f_{di} , 因此只要 $f_{di} > 1$, 那么对企业 1 来说投资是有利的, 否则就不会发生投资, 即:

$$f_{di} = \frac{1}{9b} \left[\frac{aE_f E_2 + E_f - 2r_f E_2}{E_f E_2} \right]^2 > 1。 \quad (1)$$

此条件等价于 $w/w_f > (A_1/A_f)^{\frac{1}{1-\alpha}}$, 也就是投资后的边际成本小于投资前的边际成本, 即 $f_{di} / E_f = MC_{f_{di},1} < MC_1 = r/E_1$, 也即只要满足条件

$$w/w_f > (A_1/A_f)^{\frac{1}{1-\alpha}}, \quad (2)$$

式(1)不等式才能成立, 其中 $r = (1 - \alpha)(1 - \alpha)$

$\frac{1}{1-\alpha} (1 - \alpha)^{\frac{1}{1-\alpha}}$ 。由于控股后效率参数从 A_1 下降到 A_f , 而投资国的工资水平 w 高于东道国的工资水平 w_f , 因此式(2)表明只有当两国的人力资本工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 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才是合宜的。因此, 只有当式(2)满足时, 外方才愿意到东道国投资并同意东道国控股。由此, 我们认为投资国和东道国的较大工资差距, 是中方控股的外商直接投资发生的必要条件。政府引资对国外投资者的转移支付并不是外方进行投资决策的充分条件, 中方控股的必要条件还包括: 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投入要素价格差异足够大, 并且良好的制度环境保证合资企业的效率损失足够小。

东道国政府依靠优惠政策来加强引资力度(提高引资成本),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引资目的(便于外资寻租), 但是这并不是引资成功的充分条件。引资决策者必须把短期的引资努力和长期的基础环境建设结合起来, 重视对人力资本积累、优质的政府服务、产权保护等有利于投资的区位优势的培养。仅仅只依靠优惠政策是无法吸引外资的, 东道国为外资提供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 结论

本文以中国为例,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 FDI 所有权的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 指出中方控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外资项目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综合外溢效应, 因此可把政府引资行为视为一种能产生外溢效应的公共产品供给。外资项目引进的社会价值可由萨缪尔森法则决定, 只要公共租金为正, 项目引进总是有效率的, 但由于引资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品的偏好存在差异, 引资决策的高集中度将提高主观公共租金价值和政府引资成本的支付意愿, 最后导致过度引资和高引资成本支付。

通过进一步引入外资企业跨国投资的博弈论模型, 本文得出了中方控股的必要条件, 即要求东道国市场的人力资本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东道国政府要尽可能地提供良好的投资制度环境, 以降低合资和控股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损耗。通过研究还发现, 控股比率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外资利润最大化决策, 因为外资总是通过寻租方式把合资企业控制在零利润水平, 但是控股比率参数会通过影响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而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这些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下转第 46 页)

参考文献

- [1] 张晓明,韩谨.走向“创意”产业[J].出版参考,2005(Z1):1.
- [2] 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06)[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3-12.
- [3] 朱春阳.现代传媒产品创新理论与策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8.
- [4] 埃弗雷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2:5-20.

- [5] WEINERT B. Integrating model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1):297-326.
- [6] 盛亚.技术创新扩散与新产品营销[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4-14.
- [7] MANSFIELD E.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rate of imitation[J]. Econometrics, 1961, 29(1):741-766.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 of Creative Diffusion for Enterprises in Creative Industry

Chen Jin¹, Wei Shiyang², Chen Yichao³

(1.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olic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By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reative diffusion in creative industry from the enterprise's microcosmic level.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results analysis, it conclud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reative diffusion for enterprises in creative industry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s for the creativity itself, the characters of the creative accepters,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diffusion channel, and verifies the adjusted research model.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creative industry; innovation diffusion; influence factor

(上接第 32 页)

参考文献

- [1] 杨建龙.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资博弈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2] GOMES-CASSERES, BENJAMIN. Firm Ownership preferences and hos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0, 21(1):1-22.
- [3] LECRAW, DONALD J. Bargaining power, ownership, and profitability of subsidiar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4, 15(1):27-43.
- [4] PAN Y. Influences on foreign equity ownership level in joint venture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1):1-26.

- [5] DESAI M A, FOLEY C F, HINES J.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J/OL]. NBER Working Paper 9115, 2002, <http://www.nber.org/papers/w9115>.
- [6] ANTRAS P.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9):1375-1418.
- [7] ANTRAS P, HELPMAN E. Global sourcing[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3):552-580.
- [8]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7:395-418.
- [9] DUNNING J H, RUGMAN A M. The influence of Hymer's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228-232.

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on FDI Share Right Control: The Case of China

Ru Yucong, Zhang Lif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are right control problem on FDI projects in host country with China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Cournot duopoly model, it draw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share right control. The FDI project is regarded as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 with spillover effect by host government. The difference of preference on public good and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institution lead an overvaluation of the public rent of FDI and decision makers prefer to burden more cost, which lead to the over inflow of FDI.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are right control; political economics; public rent